

世界近代后期 哲学思想史

秦志勇 杨君游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介绍的是世界近代后期哲学思想的发展状况。欧洲产业革命的完成,不仅极大地推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促使许多国家进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面对社会的各种矛盾和自然界的新现象和科学上的新发现,人们迫切需要理论的解释和哲学的概括:本书重点介绍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重点介绍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先驱的哲学思想和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先驱的哲学思想;同时,对中国的近代哲学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哲学思想,也作了扼要介绍。

目 录

世界近代后期哲学思想史

一、概 述	1
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9
1. 黑格尔学派的解体	9
2. 费尔巴哈的哲学	14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40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条件	40
2.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公开问世	47
3.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1848 年革命中的运用与发展	61
四、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思想	64
1.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赫尔岑的哲学思想	64
2. “伟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思想	68
五、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先驱	75
1. 唯意志主义的创始人——德国的叔本华及其哲学思想	75

2. 存在主义的思想先驱——丹麦的克尔凯郭尔及其哲学思想	85
3. 实证主义的创始人——法国的孔德及其哲学思想	99
4. 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美国的皮尔士及其哲学思想	109
六、中国的近代哲学	118
1. 鸦片战争前后的重要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的哲学思想	118
2. 太平天国时期的思想家——洪秀全、曾国藩的哲学思想	131
3. 戊戌变法前后的重要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哲学思想	141
七、东方其他国家的哲学	169
1. 日本近代启蒙运动的著名思想家——西周、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的哲学思想	169
2. 朝鲜近代哲学的先驱——崔汉绮、崔济愚、金玉均的哲学思想	180
3. 印度启蒙运动思想家——罗易和达耶难陀的哲学思想	185

一、概 述

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随着黑格尔的去世,黑格尔学派开始解体;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则宣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殿后人。宗教批判的需要,使他超出青年黑格尔派,转到对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他批判了黑格尔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唯心主义同一说,揭露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以及一般唯心主义的根源;他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基督教和一切宗教的世界观,并从对于宗教的起源和本质的研究中得出了极其重要的、大胆的无神论结论。他继承和发扬了以往唯物主义的成果,在批判宗教和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使唯物主义恢复了应有的权威,因而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虽然比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少些机械性,但并未克服以往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

到 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古典哲学已失去了它原有的光彩,西方哲学的发展面临着一次重大的转折。

随着 19 世纪上半叶欧洲产业革命的完成,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进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这时,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及其所引起的各种社会弊端已开始明显暴露,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以及生物进化论及其他重要科学发现的出现，极大地推进了人们认识的发展进程。面对社会的各种矛盾和自然界新的现象以及科学上的新发现，人们迫切需要理论的解释和哲学的概括。而以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为顶点的以往哲学所包含的优秀遗产，也为新哲学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往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哲学史上的深刻变革，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 30~60 年代，形成了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主要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唯物主义哲学；与此同时，这种历史条件也从另一个角度，促成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转化，逐渐产生了新的哲学思潮。

19 世纪 40 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时期。1844 年 6 月至 8 月，马克思写成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分析异化劳动出发，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趋势。《手稿》并不是一部完全成熟的著作，但《手稿》中所阐述的某些重要思想，——把物质生产看成是历史的基础，从物质生产出发去说明历史的思想；物质生产制约着精神生产，意识归根到底产生于物质生产的思想等等——为克服以往旧哲学的根本缺陷，创立唯物史观指明了方向，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创始的意义。1845 年春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提纲》中，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不仅贯彻到自然领域，而且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既与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也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创立了一种观察世界的崭新的思维方式，阐明了马克思所创立的

新世界观的核心和基本点,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制定了理论体系的纲领。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标志。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和当时革命斗争形势需要,他们合作写了篇幅巨大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在该书中,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旧哲学的批判,发展成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论述。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已经成熟,他们向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转变最终完成。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并接受委托写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融为一体的无产阶级的完备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期的最高成就。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不仅向全世界公开表明了共产党人的观点、目的和意图,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正式诞生。此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及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上半期得到显著发展,封建的农奴制发生了深刻的危机。一批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举起了反封建、反农奴制的旗帜,他们在批判统治阶级宣扬的基督教神学唯心主义过程中,形成了他们的唯物主义哲学。在40年代,最早的杰出代表是平民知识分子别林斯基以及由贵族革命家转变过来的赫尔岑、奥加辽夫等人;50~60年代杰出的代表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所论述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它是当时俄国由农奴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反农奴制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及其唯物主义哲学,是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先驱。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哲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资产阶级已失去了反封建的革命性,他们在哲学上不再需要以往用来反对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理性主义,特别是唯物主义;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所引起的现实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弊端,又使许多思想家对被当作这一社会的思想支柱的理性主义体系产生了怀疑;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也严重动摇了以往机械论的自然观和思辨形而上学世界观以及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因此,一些哲学家提出:哲学应当突破以认识论为核心的传统哲学的模式,应由以往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家所强调的对外部自然界的转向对人本身的内心结构的研究;由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研究转向对主体内在结构的研究;由倡导感觉经验或理性思维的可靠性转向肯定人的内在心理体验和非理性的直觉;由对普遍人性的颂扬转向对个人的独特个性、生命、本能的强调。他们由此开创了所谓人本主义思潮或非理性主义思潮。德国哲学家、唯意志主义的主要代表叔本华以及丹麦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克尔凯郭尔,可以说是这一思潮的主要思想先驱。而另有一些哲学家则强调,哲学应当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成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他们既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派思辨唯心主义,又反对17~18世纪的唯物主义,认为他们把哲学变成了形而上学,以致束缚和限制了科学。因此他们主张,哲学应以描述经验事实为限,以取得实际效用为目标,而不用去探索自然的本质和寻求事物的客观规律。他们由此要求建立一种排除思辨形而上学、追求实证(经验)知识的可靠性、确切性的哲学。于是这些哲学家开创了所谓科学主义或者说实证主义思潮。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的创始

人孔德以及英国哲学家、实证主义在英国的主要代表穆勒,则是这一思潮的开创者。由于这两种思潮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以往哲学的许多缺陷,暴露了它们所存在的种种矛盾,开辟了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因此,它们所标志的西方传统哲学的转向,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①。

当西方在普遍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候,东方各国大体上处于封建生产方式逐渐瓦解、资本主义因素较快增长、同时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奴役的阶段。在政治思想领域,许多国家广泛兴起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变法维新成为社会进步的一种必然趋势。在启蒙运动中,东方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们,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以及自然科学中寻求真理,并结合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思想理论。

18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历史转折时期。鸦片战争的后果,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中国近代历史面临的严重问题。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人,为争取国家独立、民主,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时的中国哲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渐从传统的经学形态向近代哲学的新形态转变。鸦片战争时期,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一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活跃于思想界。他们要求打破封建主义的思想禁锢,主张“更法”、“变古”,救亡图强,振兴民族。他们在哲学上都强调变易,注重实行,魏源等人还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他们对中国近代哲学起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为近代思想启蒙的先驱。太平天国时

^① 参见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版,第6—7页。

期,农民革命思想家洪秀全,利用西方基督教关于“上学”观念和“平等”思想以宣传农民的革命要求。主张变易的辩证法因素,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无情批判,要求平等的社会思想,是洪秀全思想中包含的积极合理的成分。太平天国革命以后,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封建知识分子,提倡西学,主张变革,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产生作了一定的准备。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最早在中国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近代哲学思想,他们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奠基人。维新派的思想家们反对封建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把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与西方近代进化论结合起来,形成了以进化论为主要特征的资产阶级哲学体系,从而摆脱了古代经学的形式。康有为的“三世”说是较系统的历史进化论;谭嗣同也主张变易哲学,宣扬“器变道变”、“一切皆变”的思想;严复则通过翻译大量西方著作,传播西学,他所宣传的进化论哲学,说明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根据进化的规律进行变法维新,从而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成为中国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普遍接受的理论。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等人则进一步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推向前进。

日本近代哲学起始于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明治维新(1868年)。明治时代初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大量吸收、移植西方的哲学。有“日本近代哲学之父”之称的西周,移植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尝试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从穆勒的功利主义出发,提出了有名的“人生三宝说”;他在汉译西方哲学术语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首先把西方的 Philosophy 译为“哲学”。有“日本的伏尔泰”美名的福泽谕吉,传播了英国的经验论和功利主义,大力宣传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以“天赋人权

说”为核心的社会政治思想；他的“文明论”，对日本走向独立富强、文明开化和实现近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东洋卢梭”之誉的中江兆民，输入了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和卢梭的民主思想，他的自由民权思想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为对自由民权理论在哲学上所作的概括，中江兆民的唯物主义哲学给日本思想界以巨大的影响，成为明治 80 年代以后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先导。

19 世纪中叶的朝鲜，由于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国内资本主义商品货币的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也打破了封建的精神支柱——朱子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富国强兵、振兴国运已成为当时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的潮流。顺应这种时代要求，产生了开化和文化启蒙等思想。崔汉绮的唯物主义哲学，用自然科学知识解释自然事物的运动变化，为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开化”思潮，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朝鲜近代哲学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崔济愚的东学思想，反对正统的朱子学和天主教，是具有反封建、反侵略内容的进步思想，为启蒙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金玉均所倡导的开化思想及他所领导的甲申政变，揭开了朝鲜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序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印度近代哲学发端于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的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一些宣传宗教和社会改革的团体领导了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的哲学理论，一般追随先前的、传统的形式。被尊称为印度“启蒙运动之父”的宗教改革家罗易，在继承奥义书一神论的基础上，摄取了伊斯兰教、基督教的思想因素，主张崇拜唯一的、永恒的、不可名状的理性实体——梵。他创立的梵社及其提出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宗教改革和哲学改革思

想,标志着印度近代哲学的发端。达耶难陀是印度启蒙运动又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宗教改革家。他批判了封建官方的哲学代表,即传统的吠檀多一元论,并对它进行了改造,提出了多元论吠檀多理论。达耶难陀为抵御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振兴印度的民族精神,喊出“回到吠陀去”的口号,主张以吠陀的精神重建印度教,改良现实的社会。随着宗教与社会改革运动的不断深入,在印度思想界出现了一批有很高造诣的哲学家,使印度哲学在近代的发展达到高峰。

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 黑格尔学派的解体

黑格尔于 1831 年去世以后，他的学生继续传播黑格尔主义。到了 1840 年，黑格尔主义的独占地位达到了顶点。但差不多在同时，黑格尔学派开始解体，分裂为右翼即老年黑格尔派和左翼即青年黑格尔派两个阵营。老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辛里克斯(1794—1861)与加布勒(1786—1853)等人；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有施特劳斯、鲍威尔兄弟，后来又有施蒂纳，费尔巴哈起初也属于这一派。

黑格尔学派的分裂，主要是由于政治斗争引起的。老年黑格尔派代表着与封建势力妥协的资产阶级势力，是封建等级制度、封建君主专制及其精神支柱——宗教的坚决捍卫者。他们把普鲁士国家说成是世界理性的体现，基督权力的体现，因而反对资产阶级激进派关于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政教分立的进步要求。青年黑格尔派则代表了激进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主张批判封建等级制度，批判贵族的专制国家，并认为首先应批判其精神支柱——基督教。他们从黑格尔的哲学中提出了他们认为是革命的理论。他们对宗教的批判，虽然是在哲学语言

下进行的,但已不是为了抽象的哲学目的,而是为着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

青年黑格尔派在反对宗教,反对封建统治,要求废除等级特权,实行资产阶级改革,以及个性解放(即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等方面的思想是一致的,但在他们内部仍然存在不同观点的争论。最初的争论是围绕福音神化展开的,后来扩展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实体”还是“自我意识”?其中除费尔巴哈外,其余诸人都是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立场上,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片面来反对黑格尔。按照黑格尔看法,“绝对精神”既是实体又是主体,在人类社会历史这个范围内,民族精神无意识地创造历史的活动则是所谓“实体”阶段,而哲学或哲学家则是所谓“自我意识”即“主体”阶段。以施特劳斯为一方和以鲍威尔为另一方的争论,就是在“实体”和“自我意识”问题上各持一端,针锋相对。

(1) 施特劳斯的宗教与哲学观点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在大学时就对宗教的研究发生了兴趣,后来在大学讲授神学,并从事耶稣的研究。1835年,他的《耶稣传》第一版问世。这部著作是第一部超出正统黑格尔的著作,它的出版是黑格尔学派解体的先声,为左派黑格尔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

施特劳斯是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上第一个在德国起来批判宗教的人。他承认黑格尔关于福音书中的神话是哲学的譬喻,但他进一步提出了研究这些神话是怎样形成的任务。他认为,耶稣的神话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在犹太人中间存在的由“救世主”来挽救世人的希望,这个神话是耶稣死后被附会在他身上的;另

一个来源是耶稣这个历史人物对当时人所留下来的深刻印象，使人把这些神话与他的政治活动结合起来。因此，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的神话是被编造出来的，而且那些编造它们的人，很可能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编造。福音书中所有关于耶稣一生的活动和事迹（除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旅行和死于何处之外）的记载，什么耶稣的奇迹和超自然的行为（如使死人复活等），实际上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关于对耶稣的种种虚构和神话传说，他认为无非是民族或团体的精神借福音编纂者的口说出来的，就是说，基督教是不自觉的精神“实体”的产物。这就是后来布鲁诺·鲍威尔所说的施特劳斯是以黑格尔哲学中的“实体”作为他的立论的依据。总之，按照施特劳斯批判的结果来看，福音书中几乎没有剩下什么可以证明其历史真实性的东西，乃至可以宣称耶稣基督本身的历史存在也是大有疑问的了。

施特劳斯并不是要否定宗教，他所批判的是基督教的一种历史形式，也就是当时存在的神话传说。他认为，当时它是表达了基督教的真理的，现在由于时过境迁，它不再适用了。在他看来，基督的信仰的内在核心是不依赖于我的批判而存在的。他认为，基督教神话的内在核心是神性与人性的统一，而基督教的神话把耶稣作为神的精神与人的精神的结合者。现在否定了这种神话的旧形式，就应该用一种新的形式使神性与人性结合起来。不过，这种结合不是通过耶稣这个人，而是通过人类。按照他的说法，如果上帝是精神，那么就可以推论，由于人也是精神，两者就没有什么不同，神与人是一个东西。所以，真实的和实际的精神存在既不是上帝本身，也不是人本身，它就是神一人。这样，人们就不应该再信仰耶稣是基督，而应该相信真正的基督，即人性。

(2) 布鲁诺·鲍威尔的宗教与哲学观点

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最初属于老年黑格尔派,后来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施特劳斯出版《耶稣传》以后,他立刻予以反驳。1839年,他出版了他的著作《约翰福音史批判》,由于其无神论和共和制的思想,他失去了波恩大学讲师的职位。但他并未因此中断自己的研究,1841年又出版了《对同观福音书作者的福音史批判》。

布鲁诺·鲍威尔提出,对基督教的批判,应探索基督教思想体系怎样为人所创造出来并成为支配世界的宗教的途径。他认为,那些给基督教铺平了道路并使其成为世界宗教的要素是历史地形成的,而不是如正统神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下子就以完备的形态从犹太教中产生出来的。他证明了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太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世界的,至少就其成为世界宗教的状况而言,它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但是,由于他的唯心主义立场,耶稣及其使徒的故事的任何历史基础都消失了。他否认施特劳斯把它们看作某种国民精神或集团精神无意识的集体创作,而认为它们是抱有一定宗教目的的个别人物完全有意识的创作活动的结果,因而是纯粹的虚构,是福音书个人的作品,换言之,是“自我意识”的产物。

布鲁诺·鲍威尔反驳施特劳斯的观点,认为象施特劳斯那样谈论福音书中的奇迹是否发生过是完全不适当的,因为他忽略了耶稣这个人出现的哲学意义。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犹太人把神性与人性分裂开来了,基督教通过耶稣这个人物就把神性与人性结合起来,这是精神发展的必然结论。因此耶稣的出现是自我意识的发展所需要的,有着哲学的必然性。他认为,福音书的作者创造性地反省了他自己接触到的不同的实在经验,他

们在记录时，对故事中的事件和耶稣传，由于各人反省不同、了解不同而有所不同，这都是由他们自己的自我意识所决定的。因此，布鲁诺·鲍威尔认为他与施特劳斯在解释福音书上的分歧，是“自我意识”与“实体”之间的分歧。

关于“实体”与“自我意识”的争论，并没有超出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范围。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这两者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施特劳斯片面地抓住黑格尔的“实体”作为他的出发点，而布鲁诺·鲍威尔则片面地抓住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作为出发点，进而把“实体”与“自我意识”对立起来。从实体发展到自我意识，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两人使每一个因素都获得了片面的、因而是彻底的发展。因此他们两人在自己的批判中都超出了黑格尔哲学的范围，但同时他们两个都继续停留在黑格尔思辨的范围内，而他们之中无论哪一个都只是代表了黑格尔体系的一个方面。只有费尔巴哈才把“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结束了施特劳斯与布鲁诺·鲍威尔之间的争论。

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以及对专制制度的某些批判，在当时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争论，他们对黑格尔的批判，也为弄清黑格尔那些极端抽象神秘的哲学范畴的现实内容准备了一些条件。但是，他们的根本弱点就在于一方面没有超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范围，这使他们对封建势力的批判受到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他们在批判宗教中，虽然看重黑格尔的方法，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方法的“合理内核”是什么，因而也不是自觉地批判地运用其“合理内核”。然而，推动哲学向前发展的，归根到底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而不是青年